



老子的大道之邦与科学社会主义

黄灿章

一

老子探求天道的目的是为了“治世救人”。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存条件和理想的政治秩序。老子从探求生成宇宙的本原及其演化运动规律,扩展到政治关怀和人生哲理。老子认为宇宙是物质运动演化生成的,物质运动的规律是由物质内部阴阳振荡对立斗争的自然规律决定的。既不是上帝安排创造的,也不受外力支配和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张松如著《老子说解》第25章芥鲁出版社第165页)。所以“天道无私有玄德。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百弗宰,建谓玄德”(同上第10章第69页),是说天道创生万物而不占为已有,施为万物而不把持,导引万物而不主宰,具有玄妙的德性,天道无欲为众生,天道没有私欲奢望,奋斗不息,养育百姓。天道无为无不为。天道无主观意志,似无作为,实则遵循自然规律无所不为。天道不争而善胜,“江海所以能成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成为百谷之王。以其无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同上第66章第400页)天道“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同上第7章第54页)天道不为自己而生存,所以能够长久生存。天道均衡显公正。“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同上第77章第450页)。老子以天道推论人道,认为天道从无到有,人道应该从有到元。天道的本能无私无欲,无能生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同上第40章第263页),人道的本能有私有欲,应该效法天道,抑制贪欲本能放纵,复归自然本性,超凡脱俗,道德高尚,上善若水,慈爱人民,无私奉献,同于天道。遵循自然客观规律有所作为,按照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治理社会,实现“民各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业”(同上第80章第468页),无压迫、无剥削、无战争的人类完美社会形态。老子认为:“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同上第29章第200页)。老子书中“为”字的含义,有的是泛指行为,有的专指顺应自然的行为,有的是特指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即指违。上述“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和“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的“为”即指违背自然客观规律的行为。是说:“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谋求霸权,是不可能得逞的。因此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同上第57章第353页),提倡以正道治圈,以智慧用兵,以不扰良,不奴役人民谋取天下。所以老子出关传递寻找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薄弱的河西走廊建立“大道之邦”基地,取得民心,矫正人类社会的发展航向。类似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所虚构的“乌托邦”之类的社会形态。“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同上第69章第364页)。

二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所向往的完美社会形态,从老子的“大道之邦”和英国莫尔的“乌托邦”,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宣言》问世,经历了由空想到科学,从理论论证完善发展到实践的斗争历程。特别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宣言》问世算起,在这一个半世纪从理论变为现实的斗争历程里,有高歌也有低潮,有胜利也有挫折,甚至也有局部的失败。纵观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都伴随着激烈的阶级冲突和你死我活的斗争,都经历着胜利与挫折,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过程。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要从根本上变革归的生产关系和私有制社会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建立一个全新的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人类社会真正平等自由全面文明的完美社会形态,一定会伴随着更加激烈复杂的冲突和斗争。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受到敌对势力疯狂地反抗破坏,必然会受到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顽强的进攻和侵袭,剥削阶段必然要通过暴力和非暴力的围攻,妄图在世界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决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社会主义进入20世纪以后,从理论变为现实,以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就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后相继建立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一个科技进步,生产为发达能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抗衡的超级大国的客观事实,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与资本主义制度,进入80年代后期,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总结了近40年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同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仅以20年短暂实践,拉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在世界上的社会地位。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暂时处于低潮的历史现象,短时间内还不能改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全面深刻地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经验教训,为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个新的突破和发展,高度概括地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升华到新的高度,奠定了社会主义运动复苏的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推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治路线,保持清醒头脑,在国内外思想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运用发展中的理论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出现的突出问题,同各种错误观点进行了积极的思想斗争,使社会主义建设能够真正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针对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特殊性,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能够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江泽民总书记六十四字的创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一再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要求,察民情、顺民意、得良心。治国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乎察其疾苦,民贵君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辩证处事思想。使社会主义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统治阶级的思想必须在每一个时期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也只有使自己的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才能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根本教训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革中误入美国隐蔽经济攻心战的交叉火力网,偏离了正确方向,发生重大失误,滑向资本主义复辟。苏联80年代初期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在1985年苏共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加快发展战略”是为了加速科技进步,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此后戈尔巴乔夫受西方“规范经济理论”的误导,不断扩大和发展了“加速发展战略”的内容。逐步以政治改革取代了经济改革,并且改变了政治改革的方向。在1986年苏共廿七大上把“加速战略”定为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苏共认为,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在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道路上,能够也应当保证苏维埃社会的全面进步,朝着共产主义前进。1987年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针对斯大林“集权官僚体制”提出必须摧毁阻碍前进的机制,建立可能有效地加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并且明确向全党全国发出进行“革命性转变”的号召。要求对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的各方面“实行真正革命的全面改造”。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并且说:“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在某一阶段发生了严重变形……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危害极大的影响。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在于这一体制。”把矛头对准了苏联的政治制度。到1990年7月苏共第廿八次代表大会上,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式形成苏共纲领和政治路线。竟在廿八大决议中写道“集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给人民、给党和社会主义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正在被取消。”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有比较严格的责任制度和监督体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贪污浪费现象。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依靠计划经济体制,以快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数倍的速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科技和军事工业的高速发展,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惧。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计划经济体制僵化越来越限制生产和社会主义发挥应有的潜力,而又不知道建立什么样的新体制。连参与高层决策的苏共领导人雷日科夫、科加乔夫和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也承认,把当时的改革理解为“自由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和“革命”等相同起来,更引起了苏联人民的心中不安。因为经典作家向来是把革命和推翻一个制度联系在一起。此后果然从对人物的批判扩展到对制度的批判。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政策都进行了批判,从对斯大林的批判扩展到对苏联70年历史的批判。导致全盘否定苏联70年历史,动摇了马列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在全国掀起了反共思潮。并一反过去处理事情优柔寡断的常态,支持刚晋升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提出取消国家对国营企业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又被美国里根政府“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暗器击重,迫使苏联采取重轻农的经济战略,造成军备开支猛增,重工业产品滞销,陷入经济困境,人民生活必需品短缺,苏联民众怨声载道,动摇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社会政治形势开始动荡,苏共领导层出现了分裂,社会上出现了反对派。即使如此,如果这时能认识到“加速发展战略”执行中的失误,苏联历史也有向好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法国海姆大学雅恩教授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能抓紧签订新联盟条约,苏联不一定解体。”然而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正在忙于批判斯大林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思想文化所有领域的政策,准备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五百天计划”。拟用一年半的时间实现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完全放开价格,取消政府控制经济的改革措施。并且举行有反对派参加的全民自由选举,致使曾经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民众,纷纷转向拥护激进改革的叶利钦,导致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结局。叶利钦以反腐败赢得民众支持,于1991年上台以后积极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采取出售、拍卖中小型国有企业,对大中型国企实行股份化改造,搞“凭证私有化”和“货币私有化”发给出售证券,向私人 and 外资出售国有资产股权、法人购持股基金和产权重组,实现“人民资本主义”,违反产权演化定律,致使俄罗斯民众名誉上虽然是股东却根本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利和机会,实际上沦为雇工,经常受到拖欠工资和失业的威胁。加上大搞“放开价格,管紧货币”,“休克疗法”的改革骗局,俄罗斯政府和民众都殷切盼望忍受西方“规范经济理论”宣传灌入的“短期阵痛”之后的经济奇迹,天真善良的俄罗斯人民盼来的却是高达2000%的恶性通货膨胀,逼使他们把私有化证券或股票低价出售,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沦为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美英联合倡导的“规范化经济理论”的改革药方中,有意识总结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系统的发掘了爆发经济危机灾难时期的教训,集中了最具破坏性的各种经济政策的组合,特别巧妙的是,倘若某一项经济政策在特定的条件下,以合理的力度恰当的时间实施,可能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是把这些经济政策以错误的方式组合起来,在错误的条件下,以错误的剂量实施,就变成了无比厉害的烈性毒药。这些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相生相克作用,能够有效遏制彼此的正面效应,相互激荡放大彼此的负面效应,促使受害国家的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而且很难将其产生的破坏作用归结于某一项具体经济措施,一时难以发现隐藏的因果关系。这副经济烈性毒药是以毁灭整个国家,令其庞大的工业和金融系统陷入瘫痪,以低廉的价格落入西方垄断财团手中。致使一个接着一个国家受骗上当。为什么无论是拉美、前苏联东欧或亚洲国家,尽管彼此之间相隔万里,具体国情有很大差异,服用了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规范化改革药方之后,所患病症几乎完全相同,到处是工业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坏帐成堆,失业人员剧增,激起社会动荡。就连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包括国际组织推荐的权威专家面对20年来上演的一幕幕经济悲剧,再也无法掩盖国际权威机构达成的“华盛顿共识”这套规范化改革药方的破坏性。也难再以“改革阵痛”的借口来搪塞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付行长兼首席经济顾问斯蒂格茨也尖锐的批判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已被拉美、俄罗斯、亚洲的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现在应该进入“后华盛顿共识”时代。美国向俄罗斯推荐改革药方的基本原则来源于“华盛顿共识”完整地遵循了西方规范经济理论,主要是科斯产权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供求,完全取消政府干预和计划调节;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明晰产权界定提高经营效率;推行银行体系私有化和商业化的金融自由化;财政改革取消政策性补贴,严格限制对国有企业贷款,实行高额的所得税,增值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赤字,取消政府管制外贸和外商投资实行全方位开放等,这些改革措施的骗局,是美国隐蔽经济战的主要杀手锏和交叉火力网。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欲望更加膨胀,把中国视为其建立霸权秩序的主要威胁,广为流传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暴露美国右翼已将中国视为重点战略目标。李登辉悍然提出了分裂中国的“七块论”,与美、英国际战略专家的设想,具有惊人的相似,绝非偶然。所以我们对于西方推荐的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不论是“华盛顿共识”或“后华盛顿共识”都应该审慎地剖析并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我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条件,以恰当的时机,巧妙的组合,即要学习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又要提高“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境界,走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防能力,严防重蹈前苏联、东欧的覆辙。

反观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的客观规律,也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必须不断地以向劳动人民让步为社会主义作准备为代价,进行自我调节改良,缓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早在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为了缓解阶级矛盾,学习了社会主义的经验,搞全民福利政策和政府干预经济实行计划调节并向工人阶级让步,取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美国又把军事上高科技转为民用,扩大高新科技发展的投资量,在生产领域促成了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并且加快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促使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雇员持股兼护利益等措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调整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使私有财产由绝对化转变为相对化,为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适应大规模生产向灵活生产制转变的需要。推行了多层次和多形式的职工参与决策管理制度,建设现代化企业。实行高工资、高消费政策,在产品分自己领域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特别是运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利,大规模地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弥补自由竞争决定生产资源配置的局限性和在上层建筑领域,允许工人运动中的改良派,社会民主党组织内阁管理资本主义社会,搞中左政治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和管理方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些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并大幅度地增加对高新技术的资本投入,重点扶植,优化产业结构,指明经济发展方向,缓和波动,控制通货膨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群众获得了工作保证和稳定收入,又使群众陷入不断追求满足,产生安于现状和维护现存制度的想法,缓和了阶级对抗情绪。但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着新的社会因素。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股份制公司曾被马克思称作是对私有制的扬弃,向生产者集体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和社会管理过渡的因素;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曾被马克思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资本主义的国有化曾被恩格斯看作是过渡到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作准备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大银行,曾被列宁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的国家机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没有资本家的合作工厂和合作社更被马克思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所以,我们坚信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正如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一样,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结果。但是如果没有了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革命飞跃,

这些单体因素仍然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总局面。但实现了这样的革命飞跃,上述这些新的因素就将大大加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前进,人类社会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在许多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合力,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曲折性。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世界形成单极多强的格局和科技信息革命的客观要求必然向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也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各国充分参与和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制定行之有效的国际准则,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能够得到正确的引导和管理,能够朝着有利于缩小南北贫富差距,有利于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加快实现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最终一定会实现全人类向往的完美社会形态。